

民主和平論與非民主和平論之 經驗檢證： 政治制度相似性的關鍵作用*

張文揚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自「民主國家之間比較不會發生戰爭」的論述經由理論與實證研究確認以來，民主和平論受到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特別是衝突研究社群以及政策實踐者的歡迎，並成為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非民主國家之間也有可能和平」的說法也獲得學者驗證，這讓衝突研究社群在探討政治制度與軍事衝突的連結上，無法統一看法與提供政策建議。本文認為，過去對「政治體制—軍事衝突」的研究，過度強調與比較民主和非民主政體的優劣以及這些體制特徵對於國際和平的影響，進而忽略了國內政治制度本身如何直接影響國際關係。本文主張，由於制度相似性提供區別敵我、加強溝通以及傳遞訊息的作用，讓制度類似的國家面臨軍事衝突前，提高解決衝突的效率以避免外交危機升級或國際摩擦，並進一步解釋為何民主國家之間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機率不高。利用 1950 年到 2001 年的數據資料，本文透過實證的方式確認這個關係。

關鍵字：民主和平、非民主和平、制度相似性、制度研究

* 本論文曾發表於 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1 月 12 日。作者感謝評論人張佑宗老師、與會學者與平思寧老師等指正，以及外交學系碩士班湯思斯、特別是許家翎兩位同學在寫作過程中的協助。作者並對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促使文章論述得以更為清楚完整並做出實質補充致上最深的謝意。文責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102 年 1 月 2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2 年 9 月 6 日

壹、引言

自 Babst (1964; 1972) 首先發現民主國家之間發生軍事衝突 (militarized conflict) 的機率不高以來,¹ 民主和平論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 民主國家之間鮮少發生戰爭 —— 的主張廣泛受到西方國際關係學者, 特別是衝突研究社群的歡迎。² 透過對於民主規範與理論的探討以及實證的檢視,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 (特別是美國) 政治人物普遍接受民主和平論的主張, 並將之轉化成爲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例如美國總統柯林頓 (Bill Clinton) 在 1994 年的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上提到: 「最終來說, 要確保我們 (指美國) 的安全以及構築持久 (durable) 的和平就要支持在各地推動民主。民主國家不相互攻擊。……這是我們……爲什麼支持俄羅斯以及其他前蘇聯集團國家內的民主改革派。」 (Clinton, 1994) 歐巴馬 (Barack Obama) 在 2009 年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上則提到: 「歐洲直到自由後才找到和平。美國從來沒有發動過一場對付民主國家的戰爭, 而我們的摯友都是保護該國公民權利的政府。」 (Obama, 2009) 以「新保守主義」爲號召的小布希 (George W. Bush) 也以此作爲外交政策的論述: 「在我的判斷中, 要達到持久的和平別無他法, 除非我們齊力使一國所需的制度形成: 奠基在正義上的公民社會、言論自由、自由選舉與人民表意的自由。」 (Bush, 2004) 由此可見, 民主和平論除了是國際關係自由主義學者探討國家互動的主要理論之外, 也日漸成爲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行動依據。

近十幾年來一個新的發展是: 非民主國家之間也存在有和平相處的模式。這樣的看法在 2002 年《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一篇文章中 (Peceny et al., 2002) 得到驗證後, 日益受到學者的討論與重視, 並引起學術上的爭辯 (黎寶文, 2011; Peceny and Beer, 2003;

1 本文在這裡與之後提到的「國際」衝突, 都是以國家配對 (dyad) 作爲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 也就是兩國之間的關係。

2 對民主和平論的討論可參考朱雪瑛 (2005); Russett and Oneal (2001); Russett (1993); 對民主和平論的質疑與反駁可見 Gowa (1999); Rosato (2003)。

Peceny and Butler, 2004; Reiter and Stam, 2003)。在該文中Peceny et al. (2002) 發現經過分類後，非民主國家中的個人型 (personalist) 政體之間與軍事型 (military) 政體之間發生衝突的機會也不高，而一黨專政型 (single-party) 政體之間雖然經歷過戰爭，但是總體來說比前兩種威權政體更為和平。³ 再者，民主和平論者早就討論到，民主國家僅是彼此之間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但並不代表民主國家本身比其他政權更愛好和平。在面對戰爭時，民主國家的領袖因為擔心戰敗而被選民淘汰，因此一旦採取非和平手段，民主國家會更努力打贏戰爭。⁴ 這種區隔性和平 (separate peace) 更讓人質疑，民主國家以推動民主或民主化為藉口散佈戰爭 (Barkawi and Laffey, 1999; Hobson, 2009; 羅致政, 1997; 石之瑜, 2010)。

近年來對於政治體制與軍事衝突的實證發現及討論著實令人感到困惑。一方面，相較於其他的政治體制，民主政體因為保障人身自由、維護集會結社權利以及辦理定期與公平的選舉等因素，被認定是較「好」的政治體制。西方國家因此積極推廣民主化以及民主制度，並根據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或是人權保障是否具有進展為標準，決定其外交政策 (如是否繼續提供需要的經濟援助或發動經濟制裁，見 Hufbauer et al., 2007: 14)。另一方面，自第三波民主化 (Huntington, 1993) 以來，民主國家在世界上所佔的比例仍未超過半數。⁵ 既然民主化的速度不如預期，則按照民主和平論者的說法，世界上的軍事衝突應該相當頻繁。然而從表 1 可以看出，1970 年代以來衝突的次數降低，且近廿年的發展是衝突多存在於不同政體之間。缺乏對上述種種現象提供統一解釋，讓現今政體和平論的研究無法真正反映國際衝突的趨勢以及演變，也無法讓我們對國際政治中的衝突與和平行為提供一致性的見解，並據此擬定政策建議。

3 必須注意到在 Peceny et al. (2002) 中，作者並未拒絕民主和平論的說法，而其實證研究也確認民主國家是最能夠降低衝突的配對 (Peceny et al., 2002: 25)。

4 這部分的論述可以參考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所謂遴選集團理論 (selectorate theory) 的說法。初步見解可參閱下面第貳節討論。

5 根據 Freedom House (2012: 28) 的統計，至 2011 年為止全世界 195 個國家中，87 個為自由國家，60 個部分自由而 48 個不自由。自 1972 年以來，雖然自由國家的數量成長一倍 (44 → 87)，但歷年數據顯示均未超過世界國家總數的半數。

表 1：1970-2011 年之間的戰爭次數

	1970-79	1980-89	1990-99	2000-11
次數(A)	26	29	15	6
衝突雙方均為非民主國家(B)	19	19	3	0
衝突至少一方為民主國家(A-B)	7	10	12	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Gleditsch et al. (2002)；Themnér and Wallensteen (2012)。

對此，本文嘗試統一理解民主及非民主和平論的共同因素，提出為什麼民主國家之間與非民主國家之間各自有和平共存的可能。過去民主和平論者集中在檢視民主制度本身的優點，例如國會制衡可以阻止行政體系恣意發動戰爭、透明決策機制提高行爲的可預測性等制度特質，以及厭惡非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等的規範特質對國際行爲的影響。非民主和平論者依循相同的討論架構，解釋非民主國家之間為何免於戰爭所苦。既然不同政體內部各自都有和平的趨勢，因此本文認為：**政體之間之所以有和平的可能，是因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相似性降低戰爭爆發的機會**。制度相似性降低政體內部選擇以軍事行動解決雙邊摩擦的可能，且相似的政治制度增加國家辨別敵我與溝通的效率，降低了雙方在預測行爲時的不確定性，進而預防軍事衝突的發生。

本文的架構如下：下一節中，本文將先回顧目前主要解釋民主與非民主和平論的觀點，之後進一步討論制度相似性如何影響國際政治行爲。雖然目前學者集中探討民主和平論，近十幾年來學者仍有不少有關制度相似性與衝突預防的理論發展。換言之，這部分將分別討論現有民主與非民主和平論的論點，隨後嘗試解釋「政治制度相似性與衝突可能性」的關連。本文隨後以實證研究方式驗證這個連結，並在第肆節中解釋採用的依變數、自變數與控制變數之操作方法與資料來源，最後則是統計模型。第伍節呈現統計結果與研究預期，並分別解釋相關變數與本文主張的理論發展是否符合。第陸節則提供結論、未來的研究方向及政策意涵。

貳、政治體制與衝突的連結

一、民主和平論與非民主和平論

就民主與非民主和平論的發展來看，前者的理論發展與實證支持較為完整。民主和平論是國際關係理論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主要主張，並且可以追溯回哲學家 Kant（1957 [1795]）。Kant 認為民主體制可以促進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其機制如下：1. 所有的憲法都應為共和制；2. 國家的法律應該以自由國家組成的聯邦為基礎制訂（聯邦可以阻止國家相互傾軋）；3. 個人權利在世界友好的條件下行使（Kant, 1957 [1795]: 120-142）。

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是民主和平論的主要倡議者。在論述中，學者普遍認定是民主政體的規範性（normative）以及制度（institutional）約束限制民主國家走向戰爭。就規範性約束而言，學者認為民主國家較尊重個人權利並容忍團體與個人的不同意見。當國內政治出現爭議時，往往是透過公平與定期的方式競爭（也就是選舉）消弭爭端。因此，當多數人的意見被採納時，少數人的權利也受到保障。民主國家內部藉由選舉移轉政權，讓因政權更動而產生的暴力衝突或是以非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的機率降至最低。將這樣的民主政治原則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就成了民主國家主要的對外政策，使民主國家之間不易發生軍事衝突。因為民主國家早已認同以非暴力方式解決問題的手段與過程，彼此之間的衝突容易透過協商或是外交手段解決。當遇到非民主國家時，民主國家則是希望非民主國家同意尊重人權以及採用和平解決內部衝突的方式，且認為有義務讓非民主國家也遵守這套價值觀（Russett, 1993: 30-33。另外可以參考 Dixon, 1994; Maoz and Russett, 1993）。這種不容忍導致當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產生政策歧異時，前者期望透過軍事手段改變非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讓他們遵守同一套人權與民主價值。⁶

6 這同時解釋為什麼民主國家並不必然比較愛好和平（Ferejohn and Rosenbluth, 2008; Risse-Kappen, 1995; Tammen et al., 2000）。

從制度面來看，民主國家受制於政治程序，在達成政治共識上因為不容易一致而較緩慢。當面對國際衝突時，執政黨、反對黨、利益團體以及人民對於是否發動戰爭或是以軍事行動回應他國產生歧見，導致決策的時間增長。民主國家的外交官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協商可行的解決方法，避免最後的武力相向。⁷ 近來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在制度上提供了另一種看法。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與維持，維繫在一個大小不一的遴選集團 (selectorate) 選出的獲勝聯盟 (winning coalition) 手中。通常非民主國家的遴選集團較小，集中在獲勝聯盟的親族、軍隊或是有利害關係的團體中。非民主國家的獲勝聯盟因此透過諸如提供恩惠或是特定利益給遴選集團等方式維持效忠，進而增加獲勝聯盟的生存。民主國家的遴選集團因為是全體選民，獲勝聯盟無法透過提供特定利益給全體選民來維持政權。相對地，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透過直接、定期以及公平的普選選出，政治人物必須提供滿足全體選民的公共財 (public goods) 維持政治生命。在國際衝突中，公共財就是贏得衝突或是取得較好的協議結果，這使得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在發動戰爭前會相當謹慎。再者，民主國家的聽眾成本 (audience costs) 較高：一旦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在國際衝突中退卻，會導致在下次的選舉中受到選民以選票懲罰。因此，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為了在戰爭中獲勝，他們會選擇容易被擊敗的國家，並在發動戰爭後盡全力動員 (try harder) 以求贏得衝突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1999; Fearon, 1994; 黃旻華, 2001; Valentino et al., 2010)。這等於告訴潛在對手民主國家不容易被擊敗，所以在選擇衝突對象時必須謹慎考慮是否真的要與民主國家交手，也解釋了為何民主國家不會與同類型國家發生軍事衝突的原因。

近年來民主和平論除了討論和平是否僅限於民主國家之間的配對以外，也嘗試從經濟的角度與研究方法上解釋民主和平論是否發生，進一步從不同的角度挑戰 (或補充) 民主和平論 (Dafoe et al., 2013; Gartzke and Weisiger,

7 從制度面的限制中，Maoz and Russett (1993: 625-626) 衍生出按照這樣的邏輯，萬一發生衝突後，民主國家會遭遇比較長時間的戰爭，因為朝野與國內團體對於如何結束戰爭很難一致，導致戰爭時間拉長。但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4) 則認為選擇容易打敗的對象反而可以使戰爭時間縮短。

2013; Mousseau, 2013; Ray, 2013)。例如在 Gartzke and Weisiger 的論述中，作者回到體系層次的主張，認為國際體系實質影響國家配對的行為，且當民主國家增加後，彼此的歧異反而有可能使他們進一步走向衝突。而 Mousseau (2009; 2013) 以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並認為在經濟交易過程中，重視契約履行 (contract enforcement) 完整度者，代表他們重視追求國內個人的自由以及在國際上經濟的成長。既然重視契約履行的國家多數都是民主國家，則他們在國際事務上也勢必較重視法治與維持市場的完整性。⁸

主張民主和平論經得起檢驗的學者則認為這些質疑並不成功。例如在 Dafoe et al. (2013) 的文章中，作者們根據資料的可重製性 (replicability)、研究的嚴謹度、分析是否經得起考驗，與最後因果推論 (causal inference) 是否嚴謹等標準，依次拒絕 Mousseau (2013) 與 Gartzke and Weisiger (2013) 的主張。而民主和平這個現象自 1816 年以來就實質存在，並延續到冷戰之後 (Dafoe et al., 2013; Park, 2013)。⁹ 最後，Tomz and Weeks (2013) 則以實驗的方式檢驗英美兩國人民對於國家面臨民主國家威脅與非民主國家威脅下的反應。結果顯示，在發展核子武器的假設情境下，民眾較不支持對這樣做的民主國家發動攻擊，這主要是來自道德的訴求。民主國家的人民認為對其他民主國家發動戰爭在道德上有瑕疵。因此，民主國家政治人物必須對選民負責的特質，也使民意影響民主國家之間較不容易產生軍事衝突的現象。

探討非民主和平論的學者大致上依循規範以及制度性論述對政體限制的脈絡，但是學者仍根據不同的非民主政體特徵區別容易發動戰爭的政體。Peceny et al. (2002) 與 Peceny and Beer (2003) 利用 Geddes (1999) 的分類，

8 值得注意的是，Mousseau 的論述更貼近近年來資本主義和平 (the capitalist peace) 的論述。針對該學派的討論可見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在 2010 年的專刊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10)。

9 例如 Mousseau (2013) 受到批評的地方在於以壽險支出 (life insurance expenditures) 當作自變數的代理變數時遺漏值 (missing value) 過多，而 Gartzke and Weisiger (2013) 則是雖然提出民主國家的比例增加後，因為差異開始產生，且共同對抗非民主國家的動機消失而使衝突增加，但是在變數操作上他們卻沒有處理到這個議題。在重新界定與操作變數後，Dafoe et al. (2013) 發現政治體制最可以解釋衝突與和平行為，而民主國家增加後內部依舊處於和平的狀態。

將非民主國家區分成個人型、軍事型以及一黨專政型。在這些國家中因為不同因素產生了和平的可能性。例如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中，軍隊被有效地內化成政黨的一部分，使成熟的一黨專政國家更能控制軍隊。再者，除了個人型政權以外，軍事型國家以及一黨專政的國家多少都受限於共識決的決策模式。這跟民主國家重視軍隊國家化、重視軍隊的專業性有異曲同工之處，使這兩種政權較難訴諸軍事衝突。

Lai and Slater (2006) 修正 Geddes 的分類，並根據非民主國家中誰具有決策權以及執行權，區分四種政體類型：黨機器 (machine)、老大 (bossism)、軍事執政團 (junta) 以及強人 (strongman)，但是提出了略微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有政黨支持的非民主政體大多比較穩定，因為非民主國家的重要部門——軍隊——受到政黨的控制。但是軍事政權因為缺乏這樣的機制，當內部發生衝突時，軍方容易發生內訌。在缺少讓內部團結一致的機制下，軍事政權往往以對外發動軍事衝突當作維繫政權合法化的手段。相對地，一黨獨大的政體因為政治運作較為穩定，面對國際衝突時顯得較為遲疑，這讓一黨專制國家比較不容易走向軍事衝突。

Kinne and Marinov (2013) 及 Weeks (2008; 2012) 的研究發現面對戰爭時，非民主國家仍有聽眾成本存在：因為國內政治團體可以彼此協調懲罰政治人物的行為、國內人民把從國際危機中退卻視為負面，以及國外可以觀察到政治人物地位不穩定性等因素，都會增加聽眾成本。這意味著民主與非民主國家在國際關係的聽眾成本負擔上一樣，進一步補充非民主政體政治人物在選擇戰爭前，如何思考人民對於軍事挫敗的反應。至於 Kinne and Marinov (2013) 則以威權體制中是否存在選舉機制 (electoral mechanism) 為標準，區分選舉式威權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與霸權式威權 (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並認為前者 (儘管不如民主國家般公正，但反對陣營有機會贏得政權) 的競爭式威權政體的政治人物在面對危機時，會如同民主政治人物一般採取較堅決的行動。綜合學者的論述，這解釋了某些威權政體之間可能不會產生衝突：因為相信對方在軍事行動中不會退讓，而且軍事挫敗容易使執政者下臺，而使他們盡量避免軍事行動。

二、民主和平論與非民主和平論的共同問題

從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民主與非民主國家內部各因本身的政治體制而自有一套行為模式，讓各自之間發生衝突的機率降低。但是現存的研究仍有不少的問題阻止我們在國際體系中尋找和平的模式。

首先，國內政治體制與國際和平之間的關係通則仍未建立。我們目前僅理解民主國家之間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模式的確存在，但我們並未（或是仍未）嘗試將這兩者之間共同處串連起來，讓從事衝突研究的學者可以統一觀點。這部分原因或許可以歸責於學者對於民主與獨裁政體的既定印象，也就是民主政體遠比獨裁政體優越的看法（朱雪瑛，2005: 138-139）。民主國家固然「對內」較能保障人權而獨裁國家對人權傷害較大，但是民主和平論與非民主和平論的發展卻已經顯示國家「對外」行為與此無關，且如前所述，民主國家並不必然較愛好和平。

再者，也是目前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在定義與測量「民主」與「獨裁」政體概念上的問題。目前一系列探討非民主和平論的論述界定不同的非民主政體（如 Geddes, 1999; Lai and Slater, 2006; 黎寶文，2011；Weeks, 2008），但這樣的分類可能過於瑣碎且根本無法精確定義。例如在其分類中，Lai and Slater (2006: 117-118) 根據決策權所在的專斷權力（despotic power）與貫徹決策的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界定四種非民主政體（如第貳之一節），但同樣都是一黨專政體制，中國大陸就必須區分成毛澤東統治（老大）時期與後毛澤東（黨機器）時期；Peceny et al. (2002) 用共享的社會主義信念定義一黨專政時，肯亞、馬來西亞、臺灣、墨西哥與塞內加爾等事實上為一黨專政的國家就要被排除在外；Weeks (2008: 44-49) 也同樣根據 Geddes (1999) 定義非民主政權，但是又增加新興民主國家（政權在民主表現上不到三年者）與君主制國家，而君主制國家又分成動態君主制（以維持君主制為目標，皇室成員為繼任人選）與非動態君主制（略偏個人型政權，君主可以從效忠自己的個人中選擇下一任領導人，君主制不一定要維持）等；最後，黎寶文 (2011: 89) 從一黨專政國家中以「統治政黨是否為共產主義政黨或是左翼政黨」和「是否有官方文件或政策聲明以馬列主義作為政策指導依據」

辨別一黨專政中的意識型態政體。

如果我們同意非民主政體應該做如此精確的定義以便釐清彼此政體之間的差異，則我們也應該同意民主政體要做此區隔，但實際上民主政體鮮少做此區分。從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來看，民主政體根據行政首長權力可區分為總統制、內閣制、偏向總統或是偏向總理的雙首長制與委員會制，但這些差異顯然不受民主和平論者關切。縱使學者同意「對於民主和平研究來說，政體類型也是非常重要的變項。……不同政體類型代表不同之政治結構和國家能力」(黎寶文，2011: 86)，遍查探討民主和平論與非民主和平論的期刊文章或是專書論著，民主政體總是以「民主」這一個變數統一操作，並未出現如「總統制之間」、「內閣制之間」與「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等發生衝突機率的分類。過於瑣碎的分類不僅無法解釋卅年來國際衝突行爲的發展趨勢，也使處理政治體制和平論時在理論上與方法上出現治絲益棼的現象。因此，我們或有必要統一目前的分歧，針對政體做最基礎的定義再探討政體如何影響世界和平。

參、相同政體之間如何降低軍事衝突的機率？

一、制度觀點

本文認為從政治制度相似性出發，可以對民主與非民主和平現象提出統一解釋，理解為何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戰爭的原因，避免了在上節中產生的問題，同時增加以制度研究預測國際政治行爲的能力。制度在國際政治行爲、國內政治發展、國際與國內經濟發展等議題首先由新制度主義學者等發展，並進一步得到衝突研究學者接受。

首先就制度來看，根據 North 的定義，制度是指：

人類設計來規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的約束 (constraints)。它們同時包含非正式約束……以及正式規則……。從古到今，制度由人類設計來創造秩序並降低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它們界定了選項 (choice set) 並據此決定交易與生產成本，以及從事經

濟活動中的利潤及可行性。(North, 1991: 97)

North 對制度的定義主要是探討經濟活動，但並不影響我們借用該定義探討國際關係。如果將 North 對制度如何影響經濟行為的解釋適用到國內政治制度與國家對外行為，則我們也可以說，相同的政治制度在國際政治行為中「創造了彼此之間同意遵守的秩序，並降低了國家行為安排中的不確定性。在國家對外行為的選項上，政治制度決定了該行為是否有利本國，例如發動戰爭的成本效益以及可行性」。因為，既然個人受同一套經濟制度規範降低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則享有同一套政治制度的國家也應可以降低國際行為中的交易成本，在本文中交易成本可視為非和平手段。

其次，相似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個區別敵（外團體，out-group）我（內團體，in-group）的訊號（signal）。換句話說，民主與非民主國家內部之所以鮮少發生戰爭，是因為他們根據政治制度知道哪些國家跟自己屬於同一陣營，而哪些不是。政治制度同時反映了國家在國際關係上選擇伙伴的行為，通常國內政治制度相同的國家彼此之間會採取較為合作的外交政策。相反地，不同制度的國家因為彼此對於國際秩序安排等認知不同而容易產生摩擦。其次，制度本身就是一種資訊（information）(Johnston, 2008: 9) 的反應。透過持續的互動，政治制度相似度高的國家會產出相似的外交政策並據此互動，又因為持續的互動發現哪些國家的外交行為與本國一致而哪些不是，提高了對相同國家行為的可預測性並減少不確定感。第三，國內制度的安排反映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當雙邊的制度相似時，衝突往往可以透過溝通或是談判達成妥協。但是制度不同時，國家往往會希望藉由重新安排對方國內政治制度的方式，使彼此的外交政策相一致，這容易導致戰爭的發生 (Werner, 2000)。

Denzau and North (1994) 的共享心智模型 (shared mental model) 進一步解釋了為何制度相似的國家不易發生衝突：**不確定性的降低**。簡要來說，心智模型是個人（或國家）對於外在環境解釋的一套認知體系，而政治制度就是個人（或國家）用來規範與安排環境的外在機制 (Denzau and North, 1994: 4)。相同制度反映了他們的心智模型，也同時增加溝通的效率。換言之，制度代表一種訊號，告訴對方國內政治行為者日常的行為模式，以及在面臨衝

突危機時可能採取的選項。共享心智模型的應用極為廣泛，例如 Solansky et al. (2008) 解釋了為何當員工與志工具有共同目標時，教堂的財務狀況比較好：對心智認知的統一，提高了對事情的理解與溝通，以及決策和有效的解決方案的形成。共享心智模型有助彼此預測行為並決定採取的步驟，促使個人在協調行動上更具彈性也更能夠採取合作的態度 (Solansky et al., 2008: 204)。Richards (2001) 也發現，當行為者之間的偏好衝突 (不一致) 時，透過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s) 的推演，共享心智模型能夠在缺乏可信的溝通時解決協調的問題。

將共享心智模型推演到國際政治上，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政治制度相似的國家不易走向戰爭。國際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一旦面對國際摩擦時，雙方對彼此決心的不確定性容易使雙邊行為最後以軍事行動作結。Weingast (1995) 提到當小國面對大國時，小國必須彼此協調行為，方不致讓大國一一突破而損害小國的利益，這主要是因為小國無法單邊懲罰大國的行為，但是團結的小國讓大國必須考慮違反國際規範的代價高於獲益。Weingast 並認為小國之間必須形成一個協調的機制，並藉由認知這個機制，讓大國無法在國際政治上損害小國利益。這種協調的機制在 Weingast 的解釋就是主權的概念：認知主權的重要性讓小國彼此協調行為，並進一步懲罰危害機制的國家 (大國) (Weingast, 1995)。作者並不挑戰這樣的觀點，並進一步認為，當我們將相關見解應用到國內政治制度對國際行為的探討時，這就是政治制度所發揮的功能。因為 Weingast 認為這樣的共享價值信念體系 (shared belief system) 應該包含三個特質：第一、這些條約或協定必須是常識且早已事先同意；第二、這些習慣必須相當清楚，讓所有的行為者可以觀察到其他成員的行為是否與這些習慣一致；第三、他們不能單獨改變這些規則 (Weingast, 1995: 453)。

同樣地，當兩國採取相同的政治制度時就代表滿足第一個特質；制度運作的規則相當清楚也使行為者可以觀察到其他成員的行為與第二個特質一致；第三個特質部分，單獨改變規則就代表該國脫離原先的團體。脫離團體後就使原團體成員對該國的行為預測難度增高，降低對彼此行為的可預測性而進一步製造衝突的發生。因此，只要是政治制度相同，不論是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之間，均可透過雙邊的政治制度運作判斷是否產生了歧異 (也就是國

際摩擦)，並較願意協調差異。

綜此，相同政治制度如何降低軍事衝突主要可從平時與戰時區分。首先，政治制度相似的國家因為採取同一種制度，較有可能產生在平時合作的行為。換言之，藉由相同的政治制度，國家之間容易以和平方式相處。例如在民主國家之間，冷戰時期或許受制於意識型態的爭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面臨共同敵人而採取共同的對外政策與立場。¹⁰ 至於冷戰後縱使不存在共同敵人，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合作關係也並未因此消失。如同歐巴馬曾說：「……我們的摯友都是保護該國公民權利的政府。」(Obama, 2009) 因此與美國採取相同制度的歐洲國家與日本，不論在冷戰時期或是冷戰後，都是美國主要的政治與經濟合作對象。至於非民主國家之間也因相同制度產生類似的行為模式，彼此的關係也較緊密。例如當查維茲 (Hugo Chavez) 上臺後採取社會主義立場，中國大陸與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就成為委內瑞拉的主要盟邦。中國大陸在 2001 年與委內瑞拉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後，委國也成為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的主要貿易夥伴以及原油來源國家之一 (向駿，2013；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美洲大洋洲司，2013)。而 1996 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其成員國主要是中國大陸、俄羅斯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如烏茲別克與哈薩克等政治體制為非民主政體的國家。誠如一位資深日本官員所言：「上合組織正在形成一個美國聯盟的敵對團體……他們不共享我們的價值觀。」(Hiro, 2006)

最後，我們可推論出，當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相似時，不論其政治體制是否為民主或非民主，其衝突的機率應該會降低。軍事衝突發生在雙邊關係緊張時，彼此可以獲得的資訊可能因此減少，但是制度相似的國家可以因為相類似的背景、文化或是信仰價值等關係，較能推測出對方可能的做法與行動，進一步早先採取預防衝突的措施 (如談判或斡旋)。研究政治制度相似性的學者發現，不論是民主政體或是非民主政體內部之間，雙邊因為外交政策的歧見、領土爭議或是其他因素而訴諸軍事行動的機率並不高 (Bennett,

10 Russett and Oneal (2001: 58) 也提到，縱使意識型態與共同敵人是冷戰的主要特徵，但為什麼西方陣營有「共同」(common) 敵人也是受到民主制度的影響：民主國家仍然視其他民主國家為主要交往對象。

2006; Souva, 2004; Werner, 2000), 結盟的機率則會增加 (Werner and Lemke, 1997), 持續敵對的行為 (enduring rivalry) 則不太可能 (Conrad and Souva, 2011)。上述的推論正可以呼應政治制度相似性在國際政治行為中的影響力。這讓我們可以認為, 在一組國家配對之中, 只要雙邊的政治制度相似, 則發生軍事衝突甚至是戰爭的機率就會減少。

據此, 本文的假設分別有以下三個:

1. 就民主國家而言:

HA1: 民主國家之間因為政治制度相同, 不容易產生軍事衝突。

2. 就非民主國家而言:

HA2: 非民主國家之間因為政治制度相同, 不容易產生軍事衝突。

3. 同時就兩者而言:

HA3: 民主國家之間與非民主國家之間因為政治制度相同, 不容易產生軍事衝突。

二、如何界定政治制度? 如何界定政體?

學者與智庫對於如何界定與操作政治制度和政體如同第貳之二節一般並不統一, 但一般做法是: 先檢討定義一個政體應該包含哪些制度後, 再根據國家在這些制度中的得分區分政體。換句話說, 當國家得分超過、介於或是低於某些制度分數時, 就被視為政治制度相同並歸類為同一類型政體。總體來說, 對政體的定義包含參與、競爭與公民自由等三個制度面向。¹¹

例如 Freedom House 以「在政府管制……之外……自發活動的機會」為標準界定自由國家, 這又包含政治權利 (political rights) 與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前者是指「個人可以自由地參與政治過程」, 後者則是個人「表意與信仰自由, 集會結社權利與法治……」權利 (Freedom House, 2013)。在 1 到 7 分的尺度 (scale) 上, 國家得分為 1 到 2.5 分者視為自由國家, 3 到 5 分部分自由而 5.5 到 7 分者不自由。Vanhanen (2000) 借用 Dahl (1972) 探討民

11 必須注意到本節的討論僅選擇較常被應用到的資料庫與定義, 根據不同定義, 相同國家在同一年裡可能會被歸類成不同的政體, 這反應政治科學研究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針對量化指標不一致的討論可見 McHenry (2000) 及 McHenry and Mady (2006)。

主與民主化的兩個重要面向：**參與 (participation)** 與**競爭 (competition)** 界定民主政體，但是並未包含公民自由（理由如第肆之一節所述）。其中前者是指「小黨在國會或總統選舉中的得票率」，後者是「實際上在選舉中投票的人口比例」（Vanhanen, 2000: 253）。若 1. 小黨得票率至少為 30%；2. 投票比例至少為 10%；3. 將兩者相乘再除以 100 後若總分超過 5 分，則可以視為民主政體。¹²

另外，在衡量政體轉型時，Gasiorowski (1996: 470) 著重在規範政治參與的規則、程序與理解上，並據此區分民主、半民主、威權與轉型中政體。例如民主國家是指：1. 個人與組織中為了所有有效的政府職位進行有效與充分的**競爭**；2. 在選擇領袖與政策時**政治參與**程度極高且沒有任何一個主要社會團體被排除在外；3. 充分的**公民及政治自由**確保政治競爭與參與的完整性。威權政體則是上述條件均不存在或是完整性不高（Gasiorowski, 1996: 471）。從 Gasiorowski 的指標中我們可以理解其指標同時涵蓋了參與、競爭與公民自由；至於 Bowman et al. (2005: 954-956) 則涵蓋**政治自由**（國家是否系統性地干涉組黨、組工會或是組利益團體與表意自由等）、**競爭的選舉**（選舉是否定期跟合憲地舉辦，選舉是否祕密與一人一票等）、**完整的參與**（憲法是否正式賦予人民普選權）、**公民優越**（civilian supremacy。軍人是否以非法手段限制民選官員）與**國家主權**（是否沒有外國勢力直接決定該國的公共政策）等五個面向。至於分數則是五個面向各有 1、0.5 與 0 分三種，五個面向中都得到 1 分者視為民主國家，否則就是非民主國家。其他指標還可見 Boix et al. (2013) 與 Bollen and Paxton (2000)。

綜上所述，本文在探討相同政治制度的政體時，將主要檢視以上幾個資料庫的共通性，並選擇最適切的指標進行操作。將指標做最基本定義有以下幾個優勢：

1. 以最基本定義進行操作避免了第貳之二節中界定非民主政體時的不一致性。將國家做最基本區分（如民主與不民主）避免了學者描繪政體時過於

12 例如小黨得票率若為 40% 而總投票率為 70% 時，則分數為 $(40 \times 70) / 100 = 28$ ，該國就可視為民主政體。

注重細部的差異而與通則化產生排擠效應。例如若以 Weeks (2008) 的定義，則動態君主制與非動態君主制實際上都排除了人民自由選擇政治領袖的機會，一黨專政國家也可以不需要考慮其意識型態是否為社會主義或是馬列思想國家，因為該類型國家中的人民除非入黨，否則沒有機會競爭政治領袖或是參與該過程。

2. 對政治制度與政體的定義與操作多數來自比較政治學者而非國際政治學者。藉由比較政治學者的定義分析與界定可以取得相對較佳的指標（但不可能有最佳指標），避免逕自界定时可能產生更大的問題。¹³

肆、變數操作以及模型選擇

一、變數操作¹⁴

依變數 本文的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 為「國家配對一年」(dyad-year)。依變數的界定是軍事衝突的開始 (onset) 與否，並分別給予 1 (開始) 與 0 (未開始) 的編碼，因此在界定上為類別 (categorical) 變數中的二元 (binary) 變數。資料來自戰爭關聯計畫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中的軍事化國際爭端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 資料庫第 3.10 版，時間涵蓋 1950 年到 2001 年 (Ghosn and Bennett, 2003; Ghosn et al., 2004; Jones et al., 1996)。¹⁵

13 本節中多數資料庫的發表都是在比較政治的頂尖期刊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中。

14 變數名稱、資料來源與涵蓋時間請參考附錄一。

15 研究涵蓋的時間是以所有變數可取得的資料庫時間長短而定 (請參閱附錄一)。「戰爭關聯計畫」是由學者 Singer 在 1963 年成立，旨在蒐集與軍事衝突相關的變數進行量化實證研究。截至 2013 年 1 月為止，已經有十幾項資料庫可供運用，例如領土變遷 (Territorial Change)、軍事化國際衝突地點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s)、政府間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等。更詳細的計畫介紹可見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而軍事化國際爭端包含了所有軍事行為 (不論其死傷人數)。另外注意到：本文依變數採用的資料庫涵蓋時間僅及於 2001 年，而未考量 2001 年之後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作者在進行統計檢證時，考量「是否能夠將所有的緊張關係列入」。在現有的資料庫中，僅有 MID 可以滿足作者的目的。通常兩國關係陷入緊張後，會有一定的口頭警告或威脅、部隊動員的程序後才升級到戰爭。但也有可能在最後發動戰事前，兩國政治人物與外交人員等就已經協調出對策並化解紛爭。因此，戰爭通常不會一觸即發，除有一個升級的過程外，也可能根本不會進入實質的戰爭階段。若是單純以「戰爭行為」作為依變數，則可以

採用這個資料庫的優點在於：MID 基本上涵蓋了所有的軍事行為，從口頭威脅到動員到交火再到戰爭等，均羅列在資料庫中。在本資料庫中，衝突的程度區分成五級：無軍事行動（等級為一）、威脅使用武力（二）、展示武力（三）、使用武力（四）以及戰爭（五）。¹⁶ 在國家配對中，當他們遭遇任何一種軍事衝突（二以上）時，編碼即為 1，否則的話視為沒有衝突（編為 0）。

另外，由於這樣的操作將所有的衝突行為放在一起討論，無法看出制度相似性如何影響後果更為嚴重的軍事行為：**戰爭行為**（等級四的使用武力與等級五的戰爭）。因此，本文也建構了另一組模型，將等級四與五都視為戰爭行為，並討論下列所有自變數對於戰爭的影響。需注意到的是，要被分類到第五級，則交火行為必須至少造成 1,000 人的死亡，若死亡人數為 250、500 甚至 999 人都不算戰爭。但這樣的分類可能過於武斷與嚴格，因此處理方式是：將第四跟第五級統一系列為戰爭行為，以包含更多的實質衝突個案在其中。

最後，1950 年到 2001 年全部國家配對的樣本數（sample size）為 548,969 筆。而一組國家配對可能在一年之中有不只一次的衝突開始（例如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間在 1969 年就發生三次衝突），某些衝突也可能涵蓋多年（例如 1980 到 1988 年的兩伊戰爭）。在本文中僅探討當年是否「開始」發生軍事衝突，次數並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裡。橫跨多年的軍事衝突也僅計入該次衝突的開始年（因此，兩伊戰爭僅考慮開始的 1980 年）。一年中若有多次軍事衝突開始，則選擇衝突層級最高的一次為觀察值。

運用的資料庫尚包括 MID 中的 ISWD（1816-2007）與 Gleditsch et al.（2002）、Themner and Wallensteen（2012）（1946-2012）。但是前者僅考慮死亡人數 1,000 人以上的戰爭，後者雖然降低門檻至 25 人，也實質排除了例如因關係惡化所導致的口頭警告（如威脅佔領領土或威脅宣戰）到動員或武裝實邊等，再到封鎖或邊境襲擾等行為。這與本文研究主旨在於「所有軍事衝突行為」相互矛盾，因此只能捨棄。對本註釋的增補感謝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16 第二級包含威脅使用武力、威脅封鎖、威脅佔領領土、威脅要宣戰、威脅要使用化學、生物以及放射性（chemical, bi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CBR）武器、威脅要加入戰爭；第三級包括展示武力、警示、核子警示、動員、鞏固邊境、邊界侵擾；第四級為封鎖、佔領領土、侵佔、攻擊、衝突、宣戰，以及使用化學、生物與放射性武器；第五級則是開戰與參加多邊戰事（Ghosn and Bennett, 2003: 3）。

自變數 本文的自變數——相同政體——來自政體 IV (Polity IV) 計畫 (Marshall et al., 2010)。政體 IV 依據每個國家的政治參與與競爭制度列出六項指標：行政首長甄補的規範 (regulation of chief executive recruitment)、行政甄補的競爭度 (competitiveness of executive recruitment)、行政甄補的開放度 (openness of executive recruitment)、行政機關的限制度 (executive constraints)、參與的規範 (regulation of participation) 以及參與的競爭度 (competitiveness of participation)。

採用這個指標的理由如下：1. 資料可取得性：Polity IV 是目前為止涵蓋最多國家與時間的資料庫。比起在第參之一節中其他資料庫，Polity IV 涵蓋面最廣；2. 客觀性：目前比較政治與國際政治在探討政治現象時相對最常引用本資料庫，因此在應用過程中資料庫在編碼與定義概念時可能產生的問題較易被排除，在應用的客觀性上較高；3. 有關公民自由部分：Polity IV 基本上涵蓋了政體的主要特徵：**競爭與參與**。雖然欠缺公民自由部分，但如同 Vanhanen (2000: 256) 所說，如果國家政治競爭與參與度高，則顯難想見該國家的公民自由不高。反過來說，當一個國家的人民享有高度的公民自由與權利時，這同時也代表該國的政治參與與競爭相當充分。對於競爭與參與程度不高的非民主國家來說也是如此。因此，並不需要另增一個指數涵蓋公民自由。

在操作上，本文將先確認各國的政治制度分數以後，進一步再從落在相同分數區塊的國家區分相同或是不同的政體（如第參之一節中資料庫的做法）。Polity IV 根據各國政治參與以及競爭的程度，區分成民主 (democratic score) 以及獨裁 (autocratic score) 兩種政體後，並分別給予 0 到 10 分的分數：0 分代表最不民主或最不獨裁，10 分則代表最民主或最獨裁。例如美國在 2008 年的民主分數為 10 分，獨裁分數為 0 分；俄羅斯在同一年份的民主分數為 5 分，獨裁分數則為 1 分。本文採用 Polity IV 的界定，依據一年之中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表現分別給予 -10 到 10 分不等的分數。其中政治參與或是競爭等政治制度受到最大限制的國家給予 -10 分，而政治參與或是競爭受到最少限制者給予 10 分。

本文再將一國的民主分數減掉獨裁分數後，得到一個 -10 到 10 分等共 21

個等級的分數：-10 為最獨裁而 10 分則是最民主（所以上述美俄的例子中，美國在 2008 年的分數就是 10 分，而俄羅斯則為 4 分）。在這個等級中進一步將國家分成三種政體。國家如果換算後取得 4 分或以上的分數則具備民主政治制度並視為民主國家（得到 2 分）；-4 分或以下則視為非民主政治制度並視為非民主國家（得到 0 分）；最後，-3 分到 3 分則視為中間政治制度國家，並視為中間無體制政體（anocracy，得到 1 分。這類國家在當年中通常為轉型中國家，因此無法界定其歸屬民主或是非民主國家）。最後，在國家配對中，作者將兩個國家的分數相減並取絕對值。當分數為 0 分時視為政體相似（民主—民主、非民主—非民主、無體制—無體制政體），2 分則為完全不同（民主—非民主政體），1 分則介於中間（如民主—無體制、非民主—無體制政體）。本文預期政治體制一致的國家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較低。

控制變數 本文另外加入了在衝突研究中常被引用與檢驗的控制變數。這些控制變數都是被認為在不影響自變數與依變數關係的前提下，引發（或抑制）軍事衝突的因素（Bremer, 1992）。第一個變數是地理相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資料來自戰爭關聯計畫中的直接相連（Direct Contiguity）數據第 3.1 版（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06; Gochman, 1991; Stinnett et al., 2002）。國家之間因為地理接近發生衝突的機率較高。因此，倘若因為領土、領海直接相連或是相隔少於 24 海哩則視為相鄰並編為 1，否則為 0。¹⁷

第二個控制變數為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distance。以英里計）。這部分我以 Bennett and Stam（2000）的 EUGene（*Expected Utility Gener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Program, Version 3.204*）程式取得數據並採自然對數（natural logarithm, $\ln(\text{distance})$ ）計算，預期兩國首都愈近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¹⁸

17 根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規定，12 海哩為一般國家的領海（territorial sea）、另外 12 海哩為鄰接區（contiguous zone）（分別為海洋法公約第 3 及 33 條），因此將 24 海哩（含）視為相近符合國際公法的規範。

18 EUGene 是由 Bennett and Stam（2000）設計的程式，其目的是縮短從事衝突實證研究的學者蒐集與整合資料庫的時間，避免因為在蒐集數據上耗費太多時間而忽略理論的發展。

第三個控制變數是貿易互賴 (trade interdependence)。1980 年代以來雙邊貿易如何影響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討論的重點之一 (Mansfield and Pollins, 2001; Mansfield and Pollins eds., 2003)，在這裡貿易互賴是指兩國的雙邊貿易量除以兩國年度進出口貿易量總和所得。本文認為兩國的貿易互賴程度愈高，則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愈低。我採用 Barbieri and Keshk (2012) 與 Barbieri et al. (2009) 的數據，並採自然對數。

第四個控制變數為國力比 (power ratio)。權力轉移學派 (power transition school) 主張權力均勢 (power parity) 是雙邊衝突可能性提高的一項重要因素 (Tammen et al., 2000)。¹⁹ 作者利用戰爭關聯計畫中國家物質能力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ersion 4.0) 數據的國家綜合能力指數 (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 衡量兩個國家的權力比例 (Singer, 1988; Singer et al., 1972)。該指數係以每一國家下列六項指標佔全世界的比例所得：能源消耗量、鋼鐵消耗量、城市人口、總人口、軍事人員數量以及軍事支出。兩國在權力比例的範圍為 0 到 1 ($0 < \text{國力比} \leq 1$)，1 為完全均勢 (意即發生衝突的機率最高)。

第五，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往往會影響到該國國民對外交政策的態度。在過去國家透過對外殖民以及佔領領土累積財富，藉以取得必要的金融與非金融資本的時代，軍事力量的累積以及衝突是國際關係的常態。但是在經濟以及貿易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財富的累積主要是透過技術以及創新，先進國家的政府與人民較不願意以武力方式開發財富的來源。本文認為高所得的國家配對之間較不易發生衝突，並設定第五個控制變數為經濟發展程度 (development)。當兩國的人均國民所得 (GDP per head) 高於美金 4,000 元時視為高所得的國家配對並給予 1 的編碼。這裡的資料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7.1 (Heston et al., 2012)。²⁰

第六，強權國家 (major powers) 或是容易與其他國家結盟、或是本身在

19 另一項因素則是新興強權是否滿意現狀的安排 (Tammen et al., 2000)。

20 Penn World Table 是由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比較與生產中心蒐集的數據，目的是在「提供 1950 到 2009 年間 189 個國家全部或部分轉換成國際價格的購買力平價與國民所得帳」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nd Produc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3)。

國際政治上的地位較高以及負擔的義務較大、或是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與頻率較高，比較容易與其他國家發生軍事衝突。本文認為強權國家有美國、中國大陸、俄羅斯（含前蘇聯）、英國、法國、德國（1990 年以後）以及日本（1990 年以後）。在一組國家配對中，兩國都為強權時編為 2、其中一方為強權時編為 1、均無強權時則編為 0，並預期在國家配對中有強權參與者衝突的可能性較高。資料來自戰爭關聯計畫中的「國家體系成員列表」(State System Membership List)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1)。最後，本文的依變數、自變數，以及除了經濟發展程度以外的所有控制變數，均由 EUGene 程式取得。

二、計量模型選擇

由於本文的分析單元為「國家配對一年」，且涵蓋 1950 年到 2001 年的資料，因此，時間序列—跨國家配對 (time-series cross-dyads) 的分析方法在這裡較為適用。我採用了 Liang and Zeger (1986) 與 Zeger and Liang (1986) 的概化估計方程式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²¹ 概化估計方程式的優點在於：相較於相當受到歡迎的 Beck and Katz (1995)、Buhaug (2005) 與 Souva (2004: 272) 採用的面板校正標準差 (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PCSE) 必須加入曲線函數 (spline function) 以便控制時間依賴 (temporal dependence) 的問題，GEE 模型可以直接進行模擬。再者，由於本文是討論制度相似國家之間發生軍事衝突與戰爭行為的機率，GEE 模型也較為實用，因為 GEE 模型較適合解釋不同型態群體 (在本文中為政治制度相似與不相似) 之間的差異 (Zorn, 2001: 474-475)。最後，所有數據皆設定一年的延遲 (lag)，以探討前一年的各解釋與控制變數如何影響後一年的依變數。

本文的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Conflict_{it} = & \alpha_0 + \beta_1 Similarity_{it-1} + \beta_2 Proximity_{it-1} + \beta_3 \ln(Distance)_{it-1} \\ & + \beta_4 \ln(Interdependence)_{it-1} + \beta_5 Ratio_{it-1} + \beta_6 Development_{it-1} \\ & + \beta_7 Power_{it-1} + \varepsilon_{it-1}, \end{aligned}$$

21 GEE 模型在政治學的應用可以參考 Boehmer and Sobek (2005) ; Souva (2004) ; Zorn (2001; 2006)。

ε 是計量模型中的誤差項 (error term)，代表可能沒有討論到的變數等。

伍、統計結果與分析

表 2 為本文的敘述統計，表 3 為經由概化估計方程式得到的統計結果，表 4 則是在自變數變動下，對於所有軍事衝突發生機率的影響。表 5 與表 6 的功能相同，但是僅討論自變數與控制變數對戰爭行為（在軍事化國際衝突中等級為四或五者）發生機率的影響。其中敘述統計的部分，若變數是類別變數則以頻率的方式、連續變數則以一般敘述統計（含平均值、標準差、最小與最大值）呈現，最後一欄則為本文認為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預期效應。預期效應是指在自變數值增加的情形下（例如類別變數是增加一個單位），對於軍事衝突發生機率的影響。例如政體相似程度中，從 0（完全相似）變成 1（介於中間）或 2（完全不相似，民主—不民主）時，作者預期軍事衝突的機率會增加。為使各表格的解讀較有效率，作者將依序討論各變數對於軍事衝突的影響之統計顯著性（表 3）以及機率的變動（表 4），再依循相同模式探討這些變數對戰爭行為的影響（表 5 及表 6）。²²

1950 年到 2001 年之間發生的軍事衝突並不多。在將近 55 萬個樣本數中僅有 1,515 個軍事衝突，其中層級為二（威脅使用武力）的有 52 次、三（展示武力）有 389 次、四（使用武力）有 1,043 次、而五（戰爭）則有 31 次。若僅考慮有交火以上的情形時，則樣本數為 1,074（1,043+31=1,074）筆。

接下來本文依次討論依變數與各控制變數對於軍事衝突發生機率的影響。從表 3 與表 4 中可以看出，體制相似性對軍事衝突的發生機率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而且統計結果大多符合各預期效果。首先在四個模型中，政體相似度的顯著度均達到 99%。例如在模型 1 裡，當僅檢驗政體相似程度對於軍事衝突的影響時，在約略 44 萬個樣本數中，²³ 如果政體相似度值由 0 變成

22 本文也針對政治制度相似性本身進行迴歸分析並取得大致上一致的結果，礙於篇幅這部分並未放在本文中，如果對這部分的統計結果與討論有興趣者請電詢作者。

23 扣除遺漏值 (missing value) 以後。

表 2：敘述統計

變數	觀察值	頻率分配 (frequency distribution)				預期效應
軍事衝突	548,969	未發生(0)：547,454；發生(1)：1,515				
戰爭行爲	548,969	未發生(0)：547,895；發生(1)：1,074				
政體相似程度	439,236	完全相似(0)：189,341 半相似 (或不相似)(1)：94,094 完全不相似(2)：155,801				+
地理相近性	548,954	兩國國界距離多於 24 海哩或不相連(0)：536,280 兩國國界距離少於 24 海哩(1)：12,674				+
經濟發展	436,939	兩國所得至少一個低於 4,000 美元(0)：377,426 兩國所得均超過 4,000 美元(1)：59,513				-
強權國家配對	548,954	兩國中均無強權國家(0)：508,830 兩國中一個為強權國家(1)：39,477 兩國中均為強權國家(2)：647				+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預期效應
距離(logged)	548,954	8.251	.781	1.609	9.421	-
國力比	548,031	.243	.268	0	1	+
貿易互賴(logged)	400,959	.001	.005	0	.330	-

表 3：統計結果 (所有的軍事衝突)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政體相似程度	.054(.010)***	.140(.018)***	.100(.017)***	.152(.018)***
地理相近性		1.306(.037)***		1.071(.045)***
距離(logged)			-.388(.014)***	-.157(.018)***
貿易互賴(logged)		.074(.008)***	.086(.008)***	.056(.008)***
國力比		-.015(.056)	.021(.055)	-.040(.057)
經濟發展		-.076(.041)*	-.232(.039)***	-.098(.041)**
強權國家配對		.392(.032)***	.449(.032)***	.451(.033)***
常數	-2.766(.013)***	-2.604(.073)***	.746(.095)***	-1.498(.143)***
樣本數	439,236	202,860	202,860	202,860
Wald χ^2	30.49***	2737.17***	1577.12***	2383.48***

括弧內為標準差。

顯著程度：***1%；**5%；*10%。

表 4：機率變動（所有的軍事衝突）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政體相似程度	+5.547%	+15.11 %	+10.474%	+16.446%
地理相近性		+269.179%		+191.916%
距離(logged)			-32.190%	-14.585%
貿易互賴(logged)		+7.695%	+8.972%	+5.797%
國力比		-1.500%	+2.132%	-3.92 %
經濟發展		-7.286%	-20.667%	-9.383%
強權國家配對		+48.022%	+56.609%	+57.050%

機率變動設定為在 1 個單位的變動下發生的機率增加或減少。

表 5：統計結果（戰爭行爲：MID 等級大於 3）

變數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政體相似程度	.052(.011)***	.161(.020)***	.116(.019)***	.171(.021)***
地理相近性		1.257(.042)***		1.047(.051)***
距離(logged)			-.365(.016)***	-.139(.020)***
貿易互賴(logged)		.070(.009)***	.084(.009)***	.055(.009)***
國力比		-.017(.063)	.023(.062)	-.038(.064)
經濟發展		-.084(.048)*	-.230(.045)***	-.102(.048)**
強權國家配對		.295(.038)***	.352(.038)***	.348(.039)***
常數	-2.876(.015)***	-2.741(.084)***	.446(.107)***	-1.763(.163)***
樣本數	439,236	202,860	202,860	202,860
Wald χ^2	21.40***	1667.02***	1079.45***	1674.53***

括弧內為標準差。

顯著程度：*** 1%；** 5%；* 10%。

1，雙邊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增加約 5.5%。換言之，完全不相似的政體配對（主要是民主—獨裁配對），相較完全相似的政體（民主、非民主或介於兩者之間）發生衝突的機率高出 11%（ $5.547\% \times 2 = 11.094\%$ ）。在模型 4（所有的解釋與控制變數均呈現）中，機率更是高出 32.89%（ $16.446\% \times 2 = 32.892\%$ ）。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制度相似性對軍事衝突的影響在統計上不僅顯著，對減少衝突的發生機率也有明顯的效果。

表 6：機率變動（戰爭行爲：MID 等級大於 3）

變數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政體相似程度	+5.329%	+17.421%	+12.307%	+18.611%
地理相近性		+251.493%		+184.903%
距離(logged)			-30.592%	-12.965%
貿易互賴(logged)		+7.248%	+8.778%	+5.617%
國力比		-1.669%	+2.327%	-3.698%
經濟發展		-8.088%	-20.585%	-9.731%
強權國家配對		+34.250%	+42.316%	+41.591%

機率變動設定為在 1 個單位的變動下發生的機率增加或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統計同時支持了「無體制政體和平論」(anocratic peace thesis) 的說法。²⁴ 儘管目前的制度和和平論者集中討論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無體制國家之間是否也有和平的模式存在，仍要進一步的學理發展與實證支持。但是對無體制政體和平的討論，本文除了依舊援引先前討論制度和和平論的論點以外（請參閱第參節），作者並在這裡提出初步的見解。對於無體制政體的政治人物來說，因為國內體制正面臨轉型（不論是從威權走向民主、或是從民主走向或返回威權），政治制度並不成熟，這使他們的對外行爲與對內政策上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對民主國家來說，對外政策失敗（如在軍事衝突中退卻或戰敗）時，民主政治可以透過定期且自由的選舉制度有效反映人民的不滿，並使當權的政治人物下臺。對威權國家來說，對外政策的失敗則較難影響政治人物是否失勢，因為他們可以透過制度化的機制壓制國內的反對勢力。無體制政體的機制均不成熟，因此對外政策的失敗可能導致政治人物需要負擔除了下臺以外的代價，例如被放逐甚至是失去生命（Goemans, 2000a; 2000b）。²⁵ 而同樣地，無體制政體也因為不成熟的機制，更容易面臨

24 對於無體制政體和平論的討論，作者感謝評審人的建議，使本文可以思考這個較少被觸及的研究議題。

25 Goemans (2000a) 也提到，由於軍事行動的結果不確定性較高，無體制政體的政治人物一旦發動軍事行動，他們會選擇避免結束戰事以免戰局不利而影響他們的政治與個人生命。這使得無體制政體訴諸軍事行動後，衝突的時間會拉長且死傷規模也較大。

內戰的問題 (Cederman et al., 2010; Hegre et al., 2001: 33-34)。無體制政體的高度不穩定性以及政治人物可能必須承擔更嚴重的後果等因素，使無體制政體之間在走向軍事衝突之前均採取預防衝突的做法。

地理相近程度對軍事衝突的影響在統計上也是顯著，且其影響也相當明顯。當一組國家配對的地理距離少於 24 海哩或是其國界相鄰時（如以陸地、海、河或是湖等作為邊界），發生衝突的機率比相隔距離多於 24 海哩的國家配對高出 192%（模型 4）至 269%（模型 2）。若是我們改用兩國首都距離為地理鄰接程度，結果在統計上依舊顯著。雖然兩國首都的距離遠近不一定反映雙方國土的鄰近程度，但因首都的敏感性，讓國家會採取比較強硬的手段以應付潛在的軍事衝突。當兩國首都的距離增加 1 個單位遠時，模型 3 顯示發生衝突的機率下降約 32%、模型 4 則為 14.6%。

本文兩個經濟控制變數：貿易互賴以及經濟發展程度與預期的效果不一。首先，國家配對的雙邊貿易互賴加深時衝突的機率上升。在模型 2 中，貿易互賴讓衝突發生的機率增加約 7.7%，模型 3 更達到 9%，且三組模型中係數均達到 99% 的顯著程度。儘管這與本文的預期效應不符合，但是目前國際關係有關貿易與衝突的連結中，確實有部分的學者認為貿易會帶來戰爭（例如 Barbieri, 1996）。其次，經濟發展對於軍事衝突的影響符合預期，但是在統計顯著度上不一。在模型 2 中僅達到 90% 的顯著程度、模型 3 為 99%、而模型 4 則為 95%。模型 3 中，當兩國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時（意味兩國國民所得均達到 4,000 美元的門檻），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較經濟發展程度均未達 4,000 美元的國家配對低 41%（ $20.667\% \times 2 = 41.334\%$ ）。

國力比的統計結果與預期效果不一致，也未達到統計顯著程度。儘管在模型 3 中兩國國力接近時發生衝突的機率高出約 2%，在模型 2 跟 4 卻分別低約 1.5% 跟 4%。再者，國力比對於衝突發生的影響並不明顯。事實上，從 -4% 到 +2% 均無法顯示當兩國國力接近時發生衝突的機率。最後，在國家配對中若兩者皆是強權國家，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可以比兩者皆不是強權國家的配對高出 114%（模型 4： $57.050\% \times 2 = 114.1\%$ ）。即使在模型 2 中該機率是最低的，仍高出 96%。強權國家這個控制變數在統計上也是顯著。

我們接下來看到自變數對於戰爭行為的影響。大致上，自變數與控制變

數對於戰爭行為發生機率的影響與上述的討論一致，但是影響程度加大。在政治相似性如何影響戰爭行為時，統計結果與顯著程度大致上雖與表 3 相同，影響度在模型 2 中約為 30.2%，但在模型 6 中則提高到 34.8%；在模型 8 裡，該機率高出 37.2%。我們可以說，政治制度相似性在預防戰爭行為的效果上變得更為明顯。

其次，地理相近性對於戰爭行為的發生機率影響依舊極為顯著。在地理上相近的國家比相隔較遠的國家多出 2.51 倍（251.49%）的機率發生戰爭行為（模型 6）。縱使在模型 8 中，該機率仍有 1.85 倍。再者，兩國首都距離愈遠，則發生戰爭行為的機率也愈低。這兩個變數的顯著度都在 1%。貿易互賴增加了戰爭行為發生的機率，這個結果跟軍事衝突並無太大差異。相同地，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配對發生戰爭行為的機率較低，在模型 7 裡僅為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之 59%。最後，國力比的影響依舊不明顯且不一致，但是強權國家之間發生戰爭行為的機率在模型 7 中可以高出 84.6%。由於控制變數並非本文的研究重心，因此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前面對表 3 及表 4 的討論。

從本文的統計結果來看，政治制度不論是民主或是非民主體制，均有消弭軍事衝突的作用。在扣除掉遺漏值後，透過近 44 萬筆觀察值的實證研究，本文接納非民主和平論的可能性並統一政治制度如何影響和平的說法。換句話說，藉由相似制度產生的效果以及約束能力，相同政治體制確實可以維持雙邊和平。

陸、結論

本文旨在提供民主與非民主和平論的一個共同解釋，並將這個解釋放在政治制度相似性上。透過實證研究，本文發現民主與非民主國家對於和平的貢獻，是在於相同的政治制度規範與約束了國家行為，並進一步提高預測及解釋類似政體行為的準確度，從中採取預防衝突的措施，進而減少軍事衝突的發生。這解釋了為何在國際衝突中不同政權之間發生衝突的機率較高、次數較多，且較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再者，相同制度讓國家容易擬定一致的

外交政策與作為，避免因為外交政策不一致，而產生國際摩擦以及國際衝突（也同時避免了軍事衝突的升級）。

本文嘗試以制度相似性處理民主和平論、威權和平論甚至是無體制政體和平論，並藉由實證模型證實了相似政體之間不會發生衝突。較重要的是，儘管威權政體的存在，在國內政治運作與國內人權保障上與民主國家相去甚遠，然在國際事務上，威權政體之間並不見得就比較容易發生軍事衝突。這個發現以現在的發展來看，開始受到部分民主和平論者的支持（如 Gartzke and Weisiger, 2013; Souva, 2004; Weeks, 2008）。事實上，晚近從聽眾成本的概念（Weeks, 2008）發展，學者也進一步提供了威權國家與民主國家和平的共同解釋，這使兩者的差異似乎有所縮小。

至於對於無體制政體和平論說法的支持仍需要學理部分更強力的支撐。這是因為基於西方國家鼓勵以民主與民主化達成世界和平的願景，民主和平論似乎僅適用於成熟的民主國家。近來學者發現，民主化的過程受限於結構的轉變以及民主架構仍未成熟的限制，新興民主化國家仍然容易走向戰爭（Mansfield and Snyder, 2002; 2005; Weeks, 2008: 61），但這僅限於國家單方面的行為。無體制政體之間的和平可能性，可能是建立在軍事衝突後果的高度不確定性。換言之，政體轉型過程中若制度較為完整且完善地建立，則仍可以避免衝突的發生（Goemans, 2000a; 2000b; Mansfield and Snyder, 2005）。因此，西方國家若是要推動民主化，則可能必須在制度安排上做更大的努力，以防這些轉型國家訴求民族主義等手段鞏固國內政治基礎。

再者，民主國家除了因為規範性與制度性因素，相互發生衝突的機率不高，但民主國家並不必然地愛好和平。以較能夠保障基本人權的國內政治制度推論這類的政體在國際政治上較愛好和平的說法，過於武斷且論證並不成熟。實際上，民主國家常以「人道」或「主權責任」等理由對外發動戰爭；冷戰時期美國甚至為了維持與蘇聯對抗過程中的優勢，支持反抗軍、武裝力量甚至是自己出兵攻擊親左派或是親共的民主國家（Rosato, 2003: 590, Table 2）。這些現象的存在，使得我們必須從制度與規範等內部因素，轉思為什麼在民主體制相似的國家，仍然有發動戰爭的可能性。這可能是再進一步檢視

民主和平論時可以思考的方向，也可以成爲下一個研究課題。²⁶

第三，儘管本文確認政治體制相似性對和平的貢獻，但實際上，和平本爲國際關係中的常態。過去戰爭的發生頻率不僅低，且經年累月地消耗在戰爭行爲中的國家也不多。誠如表 2 所示，從 1950 年到 2001 年戰爭在整體的樣本數中僅爲 1,515 次，約佔總體約 55 萬筆樣本數的千分之 2.7。政治制度對於戰爭持續性（conflict duration）的探討，或許也可以視爲對政治制度與戰爭關聯的補充。但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者仍承認民主制度對於縮短戰爭時間有較明顯的影響（如上述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4 的研究）。如何統一政治制度與戰爭持續性的討論，制度和和平論的論述才算趨於完備。

最後，政治制度雖然提供了國際和平的研究途徑，但哪一面向的政治制度，例如政治領袖的選任、政治的參與、政治過程的競爭等方式，對此特別有貢獻仍然沒有充分的討論。民主和平論對戰爭與政治體制的探討到目前爲止，已經演變成所有的民主體制對國際和平均有貢獻。這樣的論述可能過於一廂情願且早被否定（Rosato, 2003）。相反地，從民主體制與非民主體制中找出共同且一致對於國際行爲的決定性因素，方可加深對國際關係的預測與解釋。這部分的需求仍需要對於政治制度的進一步討論才可以滿足。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美洲大洋洲司

- 2013 〈中國與委內瑞拉經貿關係簡況〉。2013 年 6 月 17 日，取自 <http://md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0812/20081205968707.shtml> (Department of American and Oceanian Affairs,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China-Venezuela'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rief Introduction," Retrieved June 17, 2013, from <http://md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0812/20081205968707.shtml>)

石之瑜

- 2010 〈民主和平論所到，戰爭所到〉。中國評論新聞網，9 月 5 日。2011 年 3 月 29 日，

26 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於民主和平論之反思提供的見解，作爲作者與衝突學者日後研究時的主要題材。

取自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3/5/2/101435272.html?coluid=33&kindid=2411&docid=101435272&mdate=0905002640> (Shih, Chih-yu, 2010, "War Follows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China Review News*, September 5. Retrieved March 29, 2011, from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3/5/2/101435272.html?coluid=33&kindid=2411&docid=101435272&mdate=0905002640>)

向駿

- 2013 〈後查維茲時代之「中」委關係〉。《亞太和平月刊》，第5卷第4期。2013年6月17日，取自 <http://www.faps.org.tw/issues/subject.aspx?pk=336> (Hsiang, Antonio C., 2013, "The 'China'-Venezuela Relations in the Post-Hugo Chavez Era," *APS Monthly*, Vol.5, No.4. Retrieved June 17, 2013, from <http://www.faps.org.tw/issues/subject.aspx?pk=336>)

朱雪瑛

- 2005 〈「民主和平論」之分析與美國「推廣民主」戰略〉，《臺灣民主季刊》2(1): 123-158。(Chu, Hsueh-ying, 2005, "An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and the U.S. 'Enlargement' Strategy,"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2(1): 123-158.)

黃旻華

- 2001 〈「民主和平」研究的方法論：「聽眾成本」概念之辨析〉，《問題與研究》40(1): 87-107。(Huang, Min-hua, 2001, "A Methodological Eval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Wenti yu Yanjiu* 40(1): 87-107.)

黎寶文

- 2011 〈單一政黨威權政體間和平肇因之商榷〉，《問題與研究》50(3): 75-103。(Li, Pao-wen, 2011, "Reconsidera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Cause of Peace among Single Party Regimes," *Wenti yu Yanjiu* 50(3): 75-103.)

羅致政

- 1997 〈美國「擴展民主」戰略的理論與實踐〉，《台灣政治學刊》2(1): 191-232。(Lo, Chih-cheng, 1997, "The U.S. Strategy of Democratic Enlarge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191-232.)

B. 外文部分

Babst, Dean V.

- 1964 "Elective Governments—A Force for Peace," *The Wisconsin Sociologist* 3(1): 9-14.
1972 "A Force for Peace," *Industrial Research* 14: 55-58.

Barbieri, Katherine

-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1): 29-49.

Barbieri, Katherine and Omar M. G. Keshk

- 2012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Version 3.0,"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12, from <http://correlatesofwar.org>

Barbieri, Katherine, Omar M. G. Keshk, and Brian M. Pollins

- 2009 "Trading Data: Evaluating Our Assumptions and Coding Rul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6(5): 471-491.

Barkawi, Tarak and Mark Laffey

- 1999 "The Imperial Peace: Democracy, Force and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4): 403-434.
- Beck, Nathaniel and Jonathan N. Katz
1995 "What to Do (and Not to Do) with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3): 634-647.
- Bennett, D. Scott
2006 "Toward a Continuous Specification of the Democracy-Autocracy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2): 313-338.
- Bennett, D. Scott and Allan C. Stam
2000 "EUGene: A Conceptual Manual,"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6(2): 179-204.
- Boehmer, Charles R. and David Sobek
2005 "Violent Adolescence: St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pensity for Militarized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2(1): 5-26.
- Boix, Carles, Michael Miller, and Sebastian Rosato
2013 "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200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12): 1523-1554.
- Bollen, Kenneth A. and Pamela Paxton
2000 "Subjective Measures of Liber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1): 58-86.
- Bowman, Kirk, Fabrice Lehoucq, and James Mahoney
2005 "Measuring Political Democracy: Case Expertise, Data Adequacy, and Central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8): 939-970.
- Bremer, Stuart A.
1992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2): 309-341.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James D. Morrow,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astair Smith
1999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4): 791-807.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Michael T. Koch,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2004 "Testing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 Case of Dispute Dur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1(4): 255-267.
- Buhaug, Halvard
2005 "Dangerous Dyads Revisited: Democracies May Not Be That Peaceful after All,"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2(2): 95-111.
- Bush, George W.
2004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Blair Discussed Iraq, Middle East,"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12, from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4/11/20041112-5.html>
- Cederman, Lars-Erik, Simon Hug, and Lutz F. Krebs
2010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4): 377-394.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3 "About PWT," Retrieved June 12, 2013, from 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_index.php
- Clinton, William
 1994 "1994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12, fro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olitics/special/states/docs/sou94.htm>
- Conrad, Justin and Mark Souva
 2011 "Regime Similarity and Rival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7(1): 1-28.
-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06 "Direct Contiguity Data, 1816-2006, Version 3.1," Retrieved December 24, 2012, from <http://correlatesofwar.org/>
 2011 "State System Membership List, v2011," Retrieved November 18, 2012, from <http://correlatesofwar.org/>
- Dafoe, Allan,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2013 "The Democratic Peace: Weighing the Evidence and Cautious Infer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1): 201-214.
- Dahl, Robert A.
 1972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nzau, Arthur T. and Douglass C. North
 1994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47(1): 3-31.
- Dixon, William J.
 1994 "Democracy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1): 14-32.
- Fearon, James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577-592.
- Ferejohn, John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2008 "Warlike Democrac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1): 3-38.
- Freedom House
 2012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2: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ir Global Repercussion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13 "Methodology," Retrieved June 12, 2013, from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2/methodology>
- Gartzke, Erik and Alex Weisiger
 2013 "Permanent Friends? Dynamic Difference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1): 171-185.
- Gasiorowski, Mark J.
 1996 "An Overview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Change Datase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9(4): 469-483.
- Geddes, Barbara
 1999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Empirica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c Argument," In 9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Ghosn, Faten and Scott Bennett
2003 "Codebook for the Dyadic Militarized Interstate Incident Data, Version 3.10," Retrieved December 24, 2012, from <http://correlatesofwar.org>
- Ghosn, Faten, Glenn Palmer, and Stuart A. Bremer
2004 "The MID3 Data Set, 1993–2001: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1(2): 133–154.
- Gleditsch, Nils Petter, Peter Wallensteen, Mikael Eriksson, Margareta Sollenberg, and Håvard Strand
2002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9(5): 615–637.
- Gochman, Charles S.
1991 "Interstate Metrics: Conceptualizing, Operation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Geographic Proximity of States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7(1): 93–112.
- Goemans, H. E.
2000a "Fighting for Survival: The Fate of Leaders and the Duration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5): 555–579.
2000b *War and Punishment: The Causes of War Terminatio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wa, Joanne
1999 *Ballots and Bullets: The Elusive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gre, Havard,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2001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1): 33–48.
- Heston, Ala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
2012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7.1," Retrieved November 18, 2012, from <https://pwt.sas.upenn.edu/>
- Hiro, Dilip
2006 "Shanghai Surprise: The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veals How Power Is Shifting in the World," *The Guardian*, June 16. Retrieved June 20, 2013,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6/jun/16/shanghaisurprise>
- Hobson, Christopher
2009 "Beyond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eed for a 'Radical Historicisation' of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37(3): 631–657.
- Hufbauer, Gary Clyde, Jeffrey J. Schott, Kimberly Ann Elliott, and Barbara Oegg
2007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10 "Special Issue: A Capitalist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6(2): 107-213.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8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nes, Daniel M., Stuart A. Bremer, and J. David Singer

1996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92: Rationale, Coding Rule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5(2): 163-213.

Kant, Immanuel

1957[1795] *Perpetual Peace*.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Kinne, Brandon and Nikolay Marinov

2013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Credible Signal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7(3): 359-386.

Lai, Brian and Dan Slater

2006 "Institutions of the Offensive: Domestic Sources of Dispute Initia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1950-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1): 113-126.

Liang, Kung-ye and Scott L. Zeger

1986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Using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Biometrika* 73(1): 13-22.

Mansfield, Edward D. and Brian M. Pollins

2001 "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Recent Advances, Open Qu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6): 834-859.

Mansfield, Edward 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L. Snyder

2002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2): 297-337.

2005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oz, Zeev and Bruce Russett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24-638.

Marshall, Monty G., Keith Jagers, and Ted Robert Gurr

2010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0: Dataset Users' Manual*. Vienna, VA: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McHenry, Dean E.

2000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Democracy in Africa: An Assessment," *Democratization* 7(2): 168-185.

- McHenry, Dean E. and Abdel-Fattah Mady
2006 "A Critique of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the Degree of Democracy in Israel," *Democratization* 13(2): 256-282.
- Mousseau, Michael
2009 "The Social Market Roots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4): 52-86.
2013 "The Democratic Peace Unraveled: It's the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1): 186-197.
- North, Douglass C.
1991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 97-112.
- Obama, Barack H.
2009 "Nobel Lecture—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12, from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9/obama-lecture_en.html
- Park, Johann
2013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Democratic Peace after the Cold War,"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0(2): 178-194.
- Peceny, Mark and Caroline C. Beer
2003 "Peaceful Parties and Puzzling Personal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2): 339-342.
- Peceny, Mark and Christopher K. Butler
2004 "The Conflict Behavior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1(4): 565-581.
- Peceny, Mark, Caroline C. Beer, and Shannon Sanchez-Terry
2002 "Dictatori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1): 15-26.
- Ray, James Lee
2013 "War on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1): 198-200.
- Reiter, Dan and Allan C. Stam
2003 "Identifying the Culprit: 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Dispute Init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2): 333-337.
- Richards, Diana
2001 "Coordination and Shared Mental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2): 259-276.
- Risse-Kappen, Thomas
1995 "Democratic Peace-Warlike Democracies?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beral Argu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 491-517.
- Rosato, Sebastian
2003 "The Flawed Logic of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4): 585-602.
- Russett, Bruce M.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ssett, Bruce M. and John R. Oneal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Singer, J. David
1988 "Reconstruct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set on Materi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 1816-198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4(2): 115-132.
- Singer, J. David,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pp. 19-48 in Bruce M. Russett (ed.), *Peace, War, and Number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olansky, Stephanie T., Dennis Duchon, Donde Ashmos Plowman, and Patricia G. Martinez
2008 "On the Same Page: The Value of Paid and Volunteer Leaders Sharing Mental Models in Churche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9(2): 203-219.
- Souva, Mark
2004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0(3): 263-280.
- Stinnett, Douglas M., Jaroslav Tir, Paul F. Diehl, Philip Schafer, and Charles Gochman
2002 "The Correlates of War (Cow) Project Direct Contiguity Data, Version 3.0,"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9(2): 59-67.
-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Carole Alsharabati, Mark Andrew Abdollahian, Brian Efird, and A. F. K. Organski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 Themnér, Lotta and Peter Wallensteen
2012 "Armed Conflicts, 1946-2011,"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9(4): 565-575.
- Tomz, Michael R. and Jessica L. P. Weeks
2013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4): 849-865.
- Valentino, Benjamin A., Paul K. Huth, and Sarah E. Croco
2010 "Bear Any Burden? How Democracies Minimize the Costs of War," *Journal of Politics* 72(2): 528-544.
- Vanhanen, Tatu
2000 "A New Dataset for Measuring Democracy, 1810-199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7(2): 251-265.
- Weeks, Jessica L.
2008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2(1): 35-64.
2012 "Strongmen and Straw M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Ini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 326-347.
- Weingast, Barry R.
1995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Ideas: Shared Belief Systems and Stat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tics & Society* 23(4): 449-

464.

Werner, Suzanne

2000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Similarity o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1816-1985,”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3(2): 343-374.

Werner, Suzanne and Douglas Lemke

1997 “Opposites Do Not Attract: The Impact of Domestic Institutions, Power, and Prior Commitments on Alignment Choi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3): 529-546.

Zeger, Scott L. and Kung-yee Liang

1986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for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Outcomes,” *Biometrics* 42(1): 121-130.

Zorn, Christopher J. W.

2001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Models for Correlated Data: A Review with Ap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2): 470-490.

2006 “Comparing GEE and Robust Standard Errors for Conditionally Dependent Dat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3): 329-341.

附錄一、本文變數、資料來源與涵蓋時間

變數	資料來源	涵蓋時間
軍事衝突	CoW MID 3.10	1816-2001
政治制度	Polity IV	1800-2009
地理相近程度	CoW Direct Contiguity	1816-2006
國力比	CoW NMC 4.0	1816-2007
貿易互賴	CoW Trade Data	1870-2006
經濟發展	Penn World Table 7.1	1950-2009
主要強權國家	CoW, State System Membership List	1816-200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Non-democratic Peace Theses: The Critical Effec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Wen-yang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democracies rarely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is derived from i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However, since the 1990s the “dictatorial peace” argument, proposing that non-democracies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militarized disputes with each other, has emerged. Failing to provide a unified approach to explain why both regime types account for peace prevents us from advancing a unified explanation for the polity-conflict nexu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t is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regime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onset among institutionally similar states in political terms.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helps states identify friends or adversaries, provides information for behavior prediction, and reduces communication costs. Using the data of the period spanning 1950–2001,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conflict.

Key Words: democratic peace, non-democratic peace,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institutional studies

